

忏悔、怙过与讼冤：柳宗元谪后之文的阐释路径及其变迁

余祖坤，黄文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关于柳宗元在谪后之文中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历代论者争议颇多。唐宋正史有意将其塑造造成忠顺的忏悔者形象，这使读者多从忏悔视角理解柳文。柳宗元的思想重智识而轻伦理，主张儒释统合、天人相分，这与理学强调的道德内省、排佛卫道等观念相冲突，故理学家群体对其品格和行事多有指责，认为其文显露出其品行之失。明末的政局巨变，让士人对柳宗元的悲剧遭遇产生共鸣，进而深切认同其人，遂视其文为讼冤之作。这些观点在清前中期交汇，形成了多元化的阐释局面。但至晚清，因时局与中唐的动荡特征相似，柳文阐释又回归讼冤视角。总体而言，对柳文的阐释主要循忏悔、怙过、讼冤三条路径展开，它们随时代变迁而交织演进，深刻影响了柳文的经典化进程。

关键词：柳宗元；散文批评；永贞革新；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6)01-0195-13

柳宗元古文在历代都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而柳宗元其人却备受争议，原因主要在于他参与了永贞革新，唐宋时期的官方正史多将其描述为一起篡权的恶性事件。后世诸如欧阳修、方孝孺等台阁文人，也因之对柳宗元其人、其文主要持排斥态度。然而自宋迄清，一直不乏为永贞革新平反的声音，如范仲淹、王鸣盛等，都为永贞革新作过有力辩护。在传统中国，较之其他文体，文章与政治、道德的联系更为紧密，对作家政治、道德维度的评价也始终渗透在文章批评中，因而历代论者对其进行了多元化的阐释。

这些阐释主要围绕柳宗元被贬后创作的文章展开。核心篇目包括他被贬永州时所作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与萧翰林俛书》等致朝中旧友的乞援书信，以及《惩咎赋》《乞巧文》《愚溪诗序》等抒发贬谪之悲的辞赋、骚体文与序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晋文公问守原议》《河间传》等文章不可详考作年，无法直接判定是否为柳宗元被贬后所作，但鉴于部分论者认为其创作于贬谪期间，且提出这些文章蕴含政治讽刺意味，故本文暂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历代论者对永贞革新的评价分歧，导致他们对柳宗元谪后之文的阐释也产生差异。如《新唐书》将永贞革新定性为篡权事件，基于这一立场，该书将《惩咎赋》视为“悔念往吝”的忏悔之作^{[1](5140)}。明人崔铣亦对永贞革新持批判态度，但认为柳宗元被贬后仍不知悔改，故指责他“困而不修，过而不改”^[2]。与此相反，明人王锡爵认可永贞革新的正当性，他以此为出发点，将《惩咎赋》解读为柳宗元为自身及革新派辩白、抒发冤屈的“讼冤”之作^{[3](149)}。

由于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的否定，以及“评法批儒”运动将柳宗元视为中唐法家代表的观念，研究者多聚焦于其文中对永贞革新的颂扬及对保守势力的讽刺，以此呼应反传统的时代思潮^①，而对此前历代论者的多元化阐释则关注得不够。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研究思路受到反思，

收稿日期：2025-0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别集所附古文评点研究”(20BZW119)

作者简介：余祖坤，男，湖北监利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散文史、古代散文理论与批评，联系邮箱：yzkyzk@163.com；黄文浩，男，浙江永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散文理论与批评

柳文接受研究领域也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②，但就历代论者如何体认柳宗元被贬后对永贞革新的态度而展开的研究，目前学界尚存在不足。因此，本文拟探讨后世学人对柳宗元谪后文章的不同解读，探寻观念变化背后的历史动因，以期丰富有关柳文批评与接受的研究。

一、忏悔：唐宋正史对柳文阐释的引导

唐五代时期，柳宗元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主要是一位才华横溢却不幸轻躁失身的文学家，这一形象源于中唐官修史书《顺宗实录》。虽然《顺宗实录》是韩愈奉命编纂的，但其成书过程较为曲折，不仅历经韦处厚、沈传师、宇文籍等多人之手，还遭到多次修改，因而它代表的是当时朝廷的集体意志。《顺宗实录》对革新集团的不同成员态度不一，对于“二王”等主导人员，以抨击为多，指控较为严重。韩愈本人亦持此态度，他在《永贞行》中就严厉批评了“二王”结党营私的行为。对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顺宗实录》则指控其为依附小人的“爪牙”，批评程度相对较轻^[4]。韩愈本人亦对柳宗元持怜悯态度，批评也非常委婉，主要集中在年少气盛、遇人不淑等轻微过失上。他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他还把仕途失意视为柳宗元文学事业的机遇：“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5]不仅如此，他还在《柳州罗池庙碑》中宣扬柳宗元晚年在柳州的政绩。可见，中唐官方将永贞革新定性为结党篡权的恶性事件，将柳宗元视为成功的文学家、悔过自新的从政者，因而对他表现出明显的怜悯。

中唐官方制造的柳宗元形象，很快被《旧唐书》接受。《旧唐书》史臣批评柳宗元早年的政治选择，斥责他“昵比小人”“蹈道不谨”，因此“自致流离”^{[6](4215)}。此外，《旧唐书》还将柳宗元骚体文的特点概括为“郁悼”^③，并指出这些文章能让读者对柳宗元产生怜悯。《柳宗元传》记载说：“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6](4214)}

及至北宋，《新唐书》沿袭唐五代官方态度，批评八司马依附“匪人”^{[1](5143)}。宋祁还采摭了《与萧翰林佚书》《寄许京兆孟容书》，引导读者从忏悔的方向来体认柳宗元对永贞革新的态度。这些文章是柳宗元被贬后写给萧俛、许孟容乞援的书信，宋祁删去了文中“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等柳宗元反思革新失败原因、解读自身立场和命运的内容。正如田恩铭所总结的，这些删改“遮蔽了柳宗元私域范围内的个人思想观念，而是呈现了作为一个忏悔者和对自我认识进行反思的痴者形象”^[7]。此外，宋祁还引录了《惩咎赋》，柳宗元在此文中也思索过革新失败的原因，并将之归结为“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3](138)}，亦即时运不济。宋祁却用“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吝，作赋自儆”来介绍其创作背景^{[1](5140)}，这也无意地引导读者将这篇文章视为忏悔之作。

成书于雍熙三年(986)的《文苑英华》以及成书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唐文粹》均未收录上述三篇文章，而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书》却予以收录。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柳文接受状况下，宋祁对这些文章的采摭是值得注意的。这在客观上突出了柳宗元被贬后所处的逆境，也强调了他的忏悔态度，其意图在于深化读者对永贞革新是负面历史事件的认知，以实现训诫士人应无条件忠于君主的目的。这对柳文解读起到了规训作用，经由宋祁引导，读者更倾向于认为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怀有忏悔心态。如晁补之摘录《惩咎赋》中柳宗元自白要痛改前非的句子“苟余齿之有怨兮，蹈前烈而不颇”，并评论说：“后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读而悲之。”^[8]晁补之还强调，柳宗元的骚体文并非完全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而是对《离骚》的仿效。韩醇《诂训唐柳先生文集》卷一八引晁补之《变离骚》曰：“《离骚》以虬龙鸾凤托君子，以恶禽臭物指谗佞。王孙、尸虫、蝮蛇，小人谗佞之类也……盖《离骚》备此义，而宗元放之焉。”^{[3](1255)}经由史官的引导，读者不仅可以对柳宗元产生怜悯之心，

还能将“骚文”视作对《离骚》的模仿,这增强了柳宗元其人、其文在伦理层面的可接受程度。

二、怙过: 宋元明时期柳文阐释的新视角

唐宋正史对柳宗元的伦理化接受并未持续太久。及至北宋中期,随着柳集刻本的刊印与流播^[9],官修史书垄断柳文阐释的局面被打破。在阅读柳文的过程中,北宋士人逐渐发现其学说与儒家正统的抵牾,进而对其发起猛烈抨击。柳宗元的学术思想有重智识而轻伦理,主张天人相分、统合儒释等特点。他是僧人重巽的俗家弟子,主张融合天台佛理与中庸之道。在《非国语》《六逆论》中,他对祥瑞、灾异等天人感应论主要持否定态度,还批判了以亲缘关系用人的观念,主张任人唯贤^[10]。在《天爵论》《断刑论》中,他对智识、事功的重视超过道德、仁义等具体伦理原则^[11]。

而北宋士人的天人关系思想总体上依然偏向于保守,天人感应论依旧是当时的主要指导政治思想之一^[12],这时兴起的新儒学运动也主张归依内圣心性、重视个体道德的完善,对佛教主要持排斥态度,柳宗元因而受到激烈攻击。欧阳修就认为,因为柳宗元佞佛,所以他是“韩门之罪人”^[13]。梅尧臣也批评柳宗元说:“退之于今可以当吾永叔,其李翱、皇甫湜、柳子厚,未能当吾永叔之门人也。”^[14]在《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中,王令代韩愈驳斥了柳宗元的佞佛思想。因此,北宋部分士人不再同情柳宗元,而是斥他为小人。如苏轼说:“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耳。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15]被朱熹誉为道学六先生之一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也斥柳宗元为邪佞之人。他说:“柳宗元邪佞之人,智识浅短,岂足以窥望古君子藩篱?”^[16]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还强调,作为“外党”的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说:“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17](7732)}所以他并未沿袭宋祁的做法,转而采摭阐发劳心者治人、仁政保民等传统儒家思想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并认为这些篇目才是柳文中的“文之有理者”^{[17](7833)}。由此可见,由于学术思想的冲突,司马光并未沿袭两《唐书》对柳宗元的怜悯态度,而是有意将柳文的典范性限定在符合传统儒家思想的少数作品中。

及至南宋,洪迈响应司马光的观点,否认柳宗元被贬后真诚忏悔的看法。他说:“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及为叔文母刘夫人墓铭,极其称诵。”^{[18](267)}他指出,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柳宗元以“负罪者”暧昧地一笔带过王叔文的身份,并未加以指斥。而柳宗元在革新失败前为其母所作的墓志铭中,还曾极力称颂王叔文。洪迈据此推测,柳宗元有意掩盖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实际上他并未真诚忏悔,也不认为王叔文有罪。洪迈还质疑了宋祁引录的柳文。他说:

《孟容书》意象步武,全与汉杨惲《答孙会宗书》相似,《贞符》仿班孟坚《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内闵悼,作赋自傲。”然其语曰:“逾再岁之寒暑。”则责居日月未为久,难以言不得召也。《资治通鉴》但载《梓人》及《郭橐驼传》,以为其文之有理者。其识见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18](885)}

洪迈认为,宋祁引录柳文的系年次序失当,并指出这些柳文缺乏创新,是对杨惲、班固之文的模仿,而非有益世教之文。此外,洪迈不认同宋祁称《惩咎赋》为“不得召”而作的说法。他提出,此文作于柳遭贬的次年,宋祁的说法似乎夸大了柳宗元蒙受的苦难。显然,洪迈也和欧阳修、司马光等理学先驱的看法一致,认为柳宗元罪有应得,所以对他并不同情。

北宋以降,对柳宗元学术思想及忏悔态度的质疑,逐渐削弱了其文章的思想典范性和伦理正当性。随着负面评价渗入文学批评,宋元明时期的理学家群体对柳宗元的认知发生显著转向,他们普遍认为柳宗元被贬后仍坚持己过,本文将这一阐释路径概括为怙过。具体而言,他们对柳宗元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愤激悖理。王正德《余师录》引北宋李朴《送徐中行序》曰：“子厚雄健飘肆，有悬崖峭壑之势，不幸不发于仁义，而发于躁诞。”^{[19](378-379)}李朴认为，尽管柳文“雄健飘肆”，但柳宗元其人有“躁诞”的缺陷，而且学术思想也与正统儒家观念多有冲突，因此其文不足为观。罗大经指出，柳宗元的骚体文正是李朴指斥的躁诞之文。在《骂尸虫文》中，柳氏将忌才妒能的人喻为“尸虫”。罗大经认为，“尸虫”能够通过揭露过失来维护统治，其实有补世教，柳氏的谩骂表现出他的心术不正。他说：“柳子厚文章精丽，而心术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驳。余尝书其《骂尸虫文》后云：尸虫伏人骸窍间，狙伺隐慝，上诉之帝，意求饮食，人以是多罹咎谪，柳子憎而骂之……故仁人君子谓宜彰尸虫之功于天下。”^[20]王若虚也认为，创作骚体文是愤激悖理的骂世行为，并对此表示批评：“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无聊，不胜愤激，故触物遇事，辄弄翰以自托，然不满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苦无义理，徒费雕镌，不作可也。”^{[21](429)}他将其骚体文的特点概括为“恶语多而和气少”^{[21](430)}。戴表元则与《佩韦赋》对话，认为招致灾祸的是柳宗元欲求过多、犹疑不定的心性。他认为，因为柳氏没有坚持“刚”的原则，所以与王叔文为伍^{[22](461)}。他还强调，因为柳氏心术不正，所以才遭受不幸。他说：“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气峭，欲伸一二而丧其千百，以乱规者也。”^{[22](251)}

其二，谄媚取容。黄震对柳宗元被贬后寄书乞援的行为予以嘲笑。他说：“柳之达于上听者，皆谀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19](659)}黄震认为，这体现出柳氏品格的平庸，所以他批评柳文说：“启皆献文求哀之辞，表多世俗称颂之语，气索理短，未见柳之能过人者。”^{[19](653)}元人谭景星也认同此论，批评韩、柳都有“祈怜请哀”的谄媚行为。他说：“观其上书干谒，祈怜请哀，似若不能忘情于仕进者，于是不能尽美矣。”^[23]

其三，虚矫浮饰。柳宗元在《乞巧文》中自称“抱拙终身”，楼昉却质疑其真诚性。他将此文与韩愈《送穷文》对比，指出韩愈的“固穷”发自本心，而柳氏早已预见仕途无望，故“抱拙”是伪饰之辞^{[19](479)}。可见，楼昉对韩、柳采取了双重评价标准。明人王立道也认同此论，他说：

士之不得意于时者，其辞多愤激过情，有怨尤之心焉。予观柳州所为文，往往自谓其愚且拙，至于山水，而亦欲以愚蒙之。其作《乞巧文》，固也。然予知柳州非愚者。叔文之用事也，入其门者，类非斤斤迟钝椎鲁之士，而斤斤迟钝椎鲁者，亦必非叔文辈所能容，予是故知柳州非愚者。其作《乞巧》，抑以解嘲云耳。夫柳子所乞，其一事为文章。读《乞巧文》，即文之至巧者，又何加焉！^[24]

他认为柳入王党一事充分说明柳宗元并不“愚”，所以他“抱拙终身”的表白、以“愚”自嘲的行为都是虚假伪善的表现。

其四，讽刺君主。柳宗元《河间传》叙写了原本贞洁的河间妇，在恶人引导下逐渐走向堕落的故事。胡寅认为此文别有政治寄托，其意图在于讽刺唐宪宗。他说：“子厚至诮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创艾，乃以笔墨语言，深自文饰，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过，则其免于大戮，已为深幸。”^[25]他认为，柳氏将故事中的河间妇比作唐宪宗，是对君主的不敬和侮辱，因此不应得到怜悯。明人刘定之也认同此论。他说：“噫！既悔已，又诋主，则亦非真悔也，奚足录哉？”^[26]元人顾长卿提出，《李赤传》《蝥螋传》《河间传》等文说明柳宗元有好讥刺、不忠君的品格缺陷。他还指出，这些文章都作于柳宗元被贬谪后，他不反省错误，反而“欲以文墨语言之技戕囊隔角”，因此这些作品“虽文”但“无益”^{[3](3605)}。

在宋元明时期，怙过的柳文阐释路径之所以产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柳宗元的学术思想与理学辟佛卫儒、重视道德伦理的观念存在冲突。其次，由于正史的引导，柳宗元政治道德有亏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理学将道德与艺术紧密结合的观念，使得理学家群体更为注重作家人品。基于对柳宗元学术思想与政治道德的双重偏见，他们刻意从柳文中探寻柳宗元存在品行瑕疵的蛛丝马迹，从而论证其罪有应得，又利用这些见解强化了柳宗元的“小人”形象，最终形成批评闭环。经由

理学家群体的批评实践, 柳宗元曾被广泛承认的悔意受到了质疑。黄震就认为, 柳宗元终身不知悔悟。他说: “然愚谓溪之愚可辞, 而子厚杰然文人也, 乃终身陷叔文而不知悟, 其身之愚, 可得辞耶?”^{[19](641)}明人崔铣也说: “柳州理既昏谬, 词间俳偶, 困而不修, 过而不改。”^[2]因此, 理学名臣方孝孺多次强调, 柳宗元的品行不足为道, 故其文也不足为贵^[27]。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怙过的柳文阐释视角, 并未完全推翻忏悔这一传统认知, 而是对原有柳文批评的一种丰富和补充。事实上, 在北宋党争激烈、观念分歧严重的背景下, 不少论者并未苛责柳宗元, 甚至有所回护。例如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虽然他批评王叔文“狂甚”, 且认同官方史传对柳宗元遇人不淑的判断, 但他认为, 永贞革新本意是为了整治宦党乱政, 而非篡位营私。革新失败后, 史官以成败论人, 八司马才被指为奸邪。为此, 他回护柳宗元说: “吾闻夫子褒贬, 不以一疵而废人之业也。”^[28]主张变法的新党领袖王安石也认同范仲淹的看法, 虽然他批评柳宗元“一为叔文所诱, 遂陷入于不义”, 却仍赞其为“奇材”^[29], 与司马光对柳宗元的贬斥态度判然有别。北宋新旧两党对柳宗元的评价分歧, 也折射出政治因素对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影响。

及至南宋, 仍有附和范仲淹之声, 如严有翼就转引了范仲淹的观点^{[3](3570)}。赵彦卫亦认同范仲淹之论。他说: “盖叔文虽小人, 欲诛宦官, 强王室, 特计出下下, 反为所胜被祸耳。”^[30]陈善则认为, 虽然柳宗元清楚王叔文是小人, 但他不惜以与小人共事为代价来匡扶社稷, 所以柳宗元值得原谅^[31]。明人周思兼也赞八司马是“为小人之所诱”的“伟人”^[32]。这些意见的共性在于, 虽然他们承认永贞革新具有合理性, 但认同官方史传视“二王”为小人的评价, 认为柳宗元的政治选择确有可议之处, 所以并未质疑其悔意。

三、讼冤: 明末的柳文新诠

及至明末, 柳文阐释又产生出一种新的路径——“讼冤”说。此说认为永贞革新具有必要性, 柳宗元的谪后之文既是在洗刷自身冤屈, 也是在为永贞革新的正义性辩护。这一阐释路径的形成, 与如下因素有关。

其一, 在明末思想界, 心学冲击使理学的统治地位明显松动, 此前理学家基于儒学诉求对柳宗元的苛评也受到反思。其二, 明末士人的心态与柳宗元较为相似。柳宗元怀有一种心系天下的济世精神, 他师承啖赵《春秋》学, 以“救时之弊, 革礼之薄”^[33]为治国理念。如章士钊说: “子厚一生为学入政之大宗旨, 不外急生人三大字, 合乎此义者, 至不恤枉寻直尺以殉之, 此殆子厚贬窜终身而不悔者也。”^{[34](465-466)}而明末士人同样渴求济世, 心态的相似使其对柳宗元产生同情。其三, 明末的动荡政治局面与中唐较为相似。嘉靖以来, 随着皇权的恶性膨胀与士大夫政治的接连受挫, 政治环境持续恶化, 出现了“矿监税使”等一系列因宦官专权而引发的动乱, 士大夫群体内部的分裂也不断深化, 党争愈演愈烈^[35], 这与中唐宦党乱政的动荡局面较为相似, 因此明末士人对“二王”集团的悲剧性遭遇产生同情。

率先为永贞革新平反的是王世贞。他与范仲淹等学者同样认可永贞革新的正义性, 不同的是, 他将王叔文誉为蒙受冤屈的君子, 而非小人。他说: “嗟乎! 叔文以不良死, 而史极意苛谪, 以当权奸之首, 至与李训辈齐称, 抑何冤也?”^[36]王锡爵也认同此论。陈继儒曾向王锡爵求教, 正史记录了“二王”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的恶行, 而柳宗元却“不摈而绝之, 何也?”王锡爵回答陈继儒: “叔文与子厚皆才俊人也。叔文被顺宗特达之知, 罢宫市, 息贡献, 夺宦官之兵而授之韩泰、范希朝, 为宦官所挤贬死, 波及刘、柳, 迄无以洗雪天下之大诟。”^[37]他认为, “二王”得罪了当时大权独揽的宦官势力, 所以正史对他们的恶评其实是宦官的诽谤。经由王世贞等人的引导, 明末涌现出许多回护“二

王”集团的声音。如王志坚就说：“叔文之党，史书诋之备至，即禹锡、宗元自辩，不过谓为叔文所误而已。然其实叔文亦未有显罪也。”^[38]胡应麟也说：“柳党叔文，躁矣，然而非奸也。”^[38]胡震亨亦认为：“柳子厚污王叔文党，坐贬荒远，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淹论之，以为观子厚述作，涉道非浅……此论亦恕亦确。”^[40]

明末士人对“二王”与柳宗元的新评价，渗入了强烈的情感与迫切的现实诉求。这在章世纯的评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认为不能将永贞革新的失败简单化，因为“二王”欲打压宦官势力的行动对唐朝有“无功之功”。他提出治国理政极为复杂，并不是只要坚守道德操守就能取得成功，所以希望后人不要以此苛责柳宗元。他说：“后之持论者，知谋国之难，无轻以议为也。”^[41]他对永贞革新得失的重新思考，显然寓有借古鉴今的言外之旨。陈懿典也认为，虽然永贞革新没有成功，但是“二王”集团勇气可嘉，所以“其心良可悲矣”^[42]。宋存标也认同其观点。他说：“乃余考叔文，非惟无罪，而亦有功，惜其事不成耳。”^[43]可见，这些评价也流露出他们自身的政治创伤与理想，他们对柳宗元形象的重塑，实际上也是寻求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的过程^[44]。

随着永贞革新被明末士人正名，柳宗元也不再被苛责，而是获得同情。这标志着他们对柳宗元的态度从苛责其品格缺陷，转向同情其悲剧遭遇。与之相应，对柳宗元谪后之文的态度也从批评转为理解与欣赏，讼冤的阐释路径也应运而生。其源头可追溯至王锡爵，他评《惩咎赋》说：“此讼冤，非惩咎也，文却佳。”^{[3](49)}需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在当时尚属个例，并未占据柳文阐释的主导地位。不过，明末士人为永贞革新的平反有效弱化了对柳宗元的偏见。尽管后世论者在“二王”政治手腕是否高明等问题上仍存争议，但普遍承认永贞革新是一次士大夫从宦官手中夺回皇权、力求匡时济民却最终失败的正当行动。如陈子龙就认为永贞革新失败的根源在于“二王”的“行事躁妄”，然而“于国谋不可谓非正也”^[45]。赵绍祖亦持相似看法，提出“其失在不知叔文之不足以有成，而要非其罪”^[46]。

进入清代，同情“二王”的意见逐渐成为主流。如陈祖范认为，即便“二王”存在品行问题，但“其罪固不至此也”^[47]。全祖望则将革新失败归因于皇权新旧交替的动荡，指出：“顺宗不久其位，新旧猜嫌之际，伾、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满朝皆加以奸邪之目，遂使八司马蒙谤。”^[48]王鸣盛更详尽论证了永贞革新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还特别指出柳宗元被贬后不指斥王叔文的行为，正是其忠贞品格的体现。他说：“容斋意固不以叔文为善，而所举子厚自叙之词特为具眼，子厚非怙过也，道其实耳。”^[49]李慈铭对清代为永贞革新辩护的源流进行了梳理，认为王鸣盛为“二王”的平反堪称定论。他说：“伾文之事，自范文正首开昭雪之端，国朝田氏雯、冯氏景、何氏焯、全氏祖望、陈氏祖范，王氏鸣盛皆力为湔洗，而王氏之辨尤至，其事已明。”^{[50](678)}由此可见，明末学人为永贞革新的平反，为清代论者多元化解读柳宗元的谪后之文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清代：忏悔、怙过与讼冤的交织

及至清前中期，随着永贞革新被正名，柳宗元谪后之文的阐释愈发复杂。既有论者延续前人观点，认为柳文中仅蕴含忏悔、讼冤等单一情感。也有论者提出，柳文中还包含其他复杂情感。鉴于此，下文将聚焦清前中期论者对柳宗元谪后之文的新阐释，不再逐一罗列与前人看法重复的观点。这些新阐释，大体可归为以下三种。

其一，柳文既包含柳宗元对幼稚政治决策的忏悔，也兼具为自身境遇讼冤之意。例如，王夫之虽然从柳宗元的谪后之文中读出诸多难言之悲，且认为其政治决策并不明智，却仍对他抱有同情。他说：“读柳宗元谪后之书，‘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51]储欣在评《愚溪对》时也说：“柳子惟不自重，以至于败。柳子之败，一愚字蔽之，宋人谓宗元不愚，苛矣。”^[52]显然，王夫之、储欣都认

为柳宗元是因政治决策的幼稚而遭到贬谪的, 与其品格无关。冯景也对柳宗元充满同情。他回护柳宗元说: “然则刘、柳无求于叔文, 而叔文引刘、柳以自重, 此则情之所有也, 奈何后世君子不察, 遽斥为党哉!”^{[53](418)}他还被《寄许京兆孟容书》感动至落泪, 曾自述道: “未尝不废书流涕也。”^{[53](324)}他在《读柳子》中说: “今读贬永州后与人诸书, 既不文过, 又尝自讼, 此君子引咎伤痛之词则然, 而后世且据以为口实。”^{[53](418)}可见, 他认为柳宗元在反省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辩解, 其文既含对幼稚政治决策的忏悔, 也有对自身境遇的申诉。要之, 王夫之、储欣、冯景等明遗民不再如宋明理学家那般一味嘲讽柳宗元“愚”, 而是对其充满同情。

其二, 柳文看似是忏悔, 实则是柳宗元借此来博取同情。此论源自吕葆中。他认为, 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 柳宗元为乞得援助, 有意抑制愤激之情, 所以多作无可奈何的“忏悔语”。他说: “在子厚真是愤激不得, 只好作凄苦语、忏悔语, 以冀当途之或见怜, 那得不呜咽萧飒乎?”^[54]再如黄瑚, 他认为柳宗元“以高才废斥”, 现实处境与自我期许形成巨大落差, 所以即使他有悔改之意, 也无法完全自洽, 再加上“二王”集团还得罪了韦皋、裴均、严绶等身居要职的官员, 因而柳宗元不敢直言及“怨家仇人”, 只能仿效屈原用文学创作来“呼天以泄其不平之心”。他说: “及读子厚谪时所与许京兆、萧翰林诸书, 方以蒙宽宥、得善地为明德至渥, 即其旨多悱恻, 曾无片词加于时之用事者。又闷念往事, 作赋自警, 曰《惩咎》……若深自惩艾者, 诚善处贬矣。”^[55]显然, 吕葆中、黄瑚等清初评文者极为理解柳宗元被贬后不妄议政事、专注于文学创作的选择, 认为忏悔不过是柳宗元所采取的一种言说策略, 并非出自本心。

其三, 批评柳宗元存在修养缺陷, 对其谪后之文避而不谈。持这类态度的论者, 主要是清代官方及清代台阁文人。清代官方认可永贞革新动机的合理性。如康熙《古文渊鉴》选录了《晋文公问守原议》, 并引宋人韩醇语曰: “宗元此议, 虽论晋文之失, 其意实悯当时宦者之祸。”^[45]乾隆《唐宋文醇》亦选录此文, 并为永贞革新极力辩护。其按语曰: “《唐史》惩叔文之党, 于宗元无怨辞; 即昌黎韩愈, 亦讥宗元不自顾藉贵重。虽然, 考其时宦官既掌禁旅, 复监天下军, 叔文辈欲一旦尽解其兵柄, 还之朝廷, 其意非不善也。”^{[56](171)}但清代官方认同柳宗元有急于求成等缺陷。如乾隆评《乞巧文》说: “人病宗元以巧进被谪, 而作《乞巧文》, 自谓抱拙终身。考诸史传, 其为人盖喜立事、急功名, 以至于败, 非为机变之巧者也。”^{[56](289)}虽然他不认为柳宗元是小人, 但认为柳宗元的不幸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自身的修养缺陷。因此, 康乾官方选择对谪后之文避而不谈。乾隆《唐宋文醇》以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为底本, 储欣收录了《惩咎赋》《与李翰林建书》《寄许京兆孟容书》, 而乾隆却沿袭康熙做法, 并未选录这三篇文章。此外, 《古文渊鉴》《唐宋文醇》还分别选录了《献平淮夷雅表》《平淮夷雅》等为唐宪宗歌功颂德的柳文, 显然意在强化他依附皇权的忠顺一面, 而非可能影射当权者昏庸的叛逆一面。

清前中期, 台阁文人也多秉承上意。虽然他们承认永贞革新的正义性, 但并不同情柳宗元。如何焯评《永贞行》说: “叔文欲夺中人兵柄, 还之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57](405)}但他认为, “二王”集团当权时未能获得同僚称许, 所以被贬后无人援助也是咎由自取。他说: “但素无善行, 则异同之口得以实之, 人遂莫加怜耳。”^{[57](506)}再如李光地, 他认为柳宗元没有谨言慎行, 故罪有应得。何焯引李光地评《与杨京兆凭书》曰: “柳子自言得号为轻薄人, 观其谪后仍是此等议论, 据要津时可知。”^{[57](506)}从四库馆臣对刘禹锡的评价中, 我们或可体会其对柳宗元的态度。《四库总目》以“轻薄”评价刘禹锡入王党一事, 还指出刘、柳在革新失败后均未诋诃王叔文: “叙述前事, 尚不肯诋譏叔文, 盖其人品与柳宗元同。”^[58]可见, 清代台阁文人大多并不同情柳宗元。

这些阐释路径的形成原因, 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 在明清易代的社会巨变与朝廷高压的思想管制下, 明遗民及清初评文者普遍心怀苦闷却难直抒胸臆, 他们的处境与在政治上被弃置的柳宗元极为相似, 因而对他生出更深的“理解之同情”, 其阐释也更显体贴。其二, 清廷吸取明末宦党乱政的教

训后,不再将永贞革新视作篡权的恶性事件,但讼冤的阐释路径可能被视为对当权者的潜在挑战,因此清廷对其谪后之文多采回避态度,台阁文人也大多秉承官方立场。其三,清廷入关后推行崇儒重道政策,理学再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基于此,清代官方虽并未过于苛责柳宗元,却认同宋明理学家批评柳宗元修养不足的观点。

及至晚清,柳文阐释的方向再度转变,讼冤重新成为柳宗元谪后之文的主导性解读路径。这与晚清政局动荡、思想松动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当时,甲午战败、戊戌政变等一系列重大变故接踵而至,思想管制随之逐渐松动。与此同时,理学也不再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理学先是在汉宋之争中逐步落入下风,后又遭遇西学东渐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士大夫群体中兴起经世致用的风潮,推动了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可见,晚清士人的时代境遇与中唐、晚明极为相似,同样面临着动荡困局,却同样怀有匡时济世的抱负^[59]。

因此,晚清部分论者再度与柳宗元的政治无力感与理想破灭感产生共鸣,于是选择以讼冤的视角来阐释柳文。如焦循评《寄许京兆孟容书》为“自讼俱真切”^{[3](1973)}。嘉道年间,徐经也把《与萧翰林俛书》视为柳宗元无罪的证明。他说:“子厚之有罪,乃仇怨造作粉饰之辞,不意蔓延至今,竟无的然昭析于冥冥之间。余读《与萧思谦书》悲之……吾愿读史者先辨叔文之枉死,而子厚辈之无罪自见矣。”^[60]咸同年间,李慈铭甚至将柳宗元的骚体文都阐释为讼冤。他说:

“二王八司马”之事,千载负冤,成败论人,可为痛哭。子厚终身摧抑,见于文辞者若不胜其哀怨,而绝不归咎叔文。若《牛赋》《吊裴弘文》《吊乐毅文》诸作,意皆为叔文发,盖深痛其怀忠而死,雅志不遂。虽与中朝当事者言,亦但称之曰罪人,曰负罪者,终未尝显相诋斥。至《与许孟容书》,则几颂言其冤矣。^{[51](756)}

由此可见,晚清论者多认为谪后之文蕴含着为永贞革新辩护的不平之意,而这也逐渐成为近代以来柳文阐释的主流路径。章士钊的评价便印证了这一点。他说:“两书子厚自道隐曲,如见其人,可招致千载同情者之颂叹……或谓此讼冤,非惩咎,说亦有理。”^{[34](49)}

柳文阐释路径的变迁,还促使晚清论者对后人为何贬斥柳宗元进行反思。此前,范仲淹将其归咎于史官以成败论人的观念,而秦笃辉却认为理学家的道德苛责才是其蒙冤的主因。他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者,盖犹万口一声。”^[61]不仅如此,他们还重新审视了韩愈对柳宗元的态度。丁晏提出,其实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曾为柳宗元鸣冤。他说:“柳州以学道之儒一蹶不振,致为清议所摈。呜呼!何其冤也……及读昌黎《顺宗实录》,叙叔文、伾之事甚备。盖心伤柳州之冤而不能显言,故详著之,以俟后人之别白,其旨微矣。”^[62]参与戊戌变法的陈三立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韩愈将柳宗元界定为一位失败的从政者和成功的文学家,比起直接的诋毁更令人感到沮丧。他说:“吾观柳子厚辈,欲佐王叔文尽收奄宦兵柄,还之朝廷,此为安危存亡国家切要之大计……明允察终始如韩公,为志其墓,尚称子厚‘勇于为人,不自贵重’。吾恐灰志士之心,塞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之义,将不戒于受祸,不戒于当时后世诬毁谤议,而戒于韩公痛之惜之一言。”^[63]显然,在陈三立看来,韩愈对柳宗元的评价,虽然看似痛惜,但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批评,这种评价可能比直接的诋毁更让后世有志之士心冷,因为它可能动摇其为公忘私的政治热情和奉献精神。

五、柳宗元谪后之文阐释的变迁与柳文经典化之关系

无论是唐宋史官为维护统治而将柳文阐释为忏悔之作,宋明理学家从思想伦理角度对柳宗元的批判,还是明末与清末士人因寄望中兴而将柳文视作讼冤之文,都体现出读者群体依据现实需求重塑柳宗元形象的现象,这对柳文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裴云龙指出:“文章选本的编纂是文学经典化

的基本表现形式, 具有标举经典、传播经典的重要功能。”^[64]因此, 通过分析柳文阐释路径变迁与柳文选录数量变化的关系, 可为观察其经典化历程提供独特视角。

《顺宗实录》与两《唐书》等官修正史出于教化目的, 将柳宗元塑造为温驯的忏悔者, 对其指控仅限于年轻气盛、遇人不淑等轻微过失, 并未完全否定其价值, 这为柳文在唐五代及宋初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在当时的重要文章选本中, 柳文的选录数量与韩文相当, 如《文苑英华》收录柳文 181 篇、韩文 128 篇; 《唐文粹》收录柳文 59 篇、韩文 66 篇^④。

而南宋理学家群体有意将柳文的典范性限定在少数合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篇章, 这影响了其对柳文的价值判断。例如在吕祖谦、楼昉、汤汉、谢枋得等理学家的选本中, 柳文选录数量常少于韩愈、欧阳修、苏轼; 而在非理学家的王霆震的选本中, 柳文选录数量却多于欧、苏(见表 1)^⑤。可见, 尽管南宋理学家并未否认柳文的文学典范性, 但对其评价明显低于其他唐宋文家。

表 1 南宋时期五种文章选本中“唐宋四大家”选文数量统计表^⑥

选者与选本	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轼
吕祖谦《古文关键》	13	8	11	18
楼昉《崇古文诀》	25	14	18	15
汤汉《妙绝古今》	6	1	7	8
谢枋得《文章轨范》	32	5	15	12
王霆震《新刊诸儒评点古文集成》	27	16	15	13

在明末宦官乱政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二王”集团被重塑为孤愤含冤的志士, 柳文的讼冤新论也应运而生。不过, 由于清廷推行清真雅正的文教政策, 排斥悲怨激昂的文风, 同时理学被重新确立为官学, 导致清前中期的读者对明末柳文的讼冤新论未予积极响应。即便如此, 相较于理学家群体刻意探寻柳宗元品格瑕疵的观念, 这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柳文的接受处境。因此, 在方苞、储欣、乾隆、刘大櫟等的选本中, 柳文的选录数量不再居于“唐宋四大家”末席。但在张伯行、姚鼐等理学色彩浓厚的选家的选本中, 柳文仍居末位(见表 2)。

表 2 明清时期九种文章选本中“唐宋四大家”选文数量统计表^⑦

选者与选本	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轼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	173	131	280	229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	60	18	38	27
康熙《古文渊鉴》	29	19	29	50
方苞《古文约选》	71	44	59	34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	267	162	78	210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	94	49	63	75
乾隆《唐宋文醇》	99	87	81	85
刘大櫟《唐宋八家文百篇》	31	19	20	11
姚鼐《古文辞类纂》	132	37	66	52

在动荡变革的时代, 渴求中兴的晚清士人在心态上与柳宗元多有相似, 故而与柳宗元产生强烈共鸣^[65], 陈三立甚至对柳文有所模仿。陈柱就指出: “而柳文写意深刻, 笔墨削峭, 近人陈三立实近

之。”^[66]因此,回护柳宗元的调门在清末民初变得愈发高亢,甚至盛行着“扬柳抑韩”的风气。正如杜晓勤所说:“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大多扬柳抑韩,其主要理由是韩愈的人格粗鄙、思想粗浅、文学直率,不若柳宗元忠直坚决、思想深邃、文学婉深有致。”^[67]其对柳宗元忠直坚决的评价,显然是对王鸣盛等人观点的认同,即柳宗元并未后悔参与永贞革新,而是通过曲折含蓄的笔法为“二王”讼冤。

可见,新文化运动以来,柳宗元其人其文获得的空前赞誉,与讼冤阐释不无关系,而这种解读实际上是对怙过阐释的选择性接受。在事实判断层面,他们都不满足于官方史官对柳文的忏悔阐释,而是通过品评柳文中耐人寻味的细节,揭示柳宗元思想情感的复杂性。吊诡之处在于,有人视其为柳宗元怙恶不悛的表现,有人却将其视为理想破灭后的无奈和对黑暗现实的控诉。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政治诉求、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以及对永贞革新的不同评价。

六、结语

柳宗元被贬之后,受制于谪臣身份,自然难以明言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因此,要精确还原这个问题,并给出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实属不易。而如果我们聚焦柳文本身,或许能捕捉到他细腻复杂的情感脉络。

在元和四年(809)所作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声称革新是为了实现“立仁义”的理想,而非沽名钓誉,即“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他还反思了革新失败的原因,并将之归结为缺乏政治经验与人脉声望,即“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3](1955)}。但在元和五年(810)所作的《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中,他又将仕途的失败归咎于“好名誉”,透露出强烈的焦虑与悔意。他说:“追计往时咎过,日夜反复,无一食而安于口、平于心。若是者,岂不以少好名誉,嗜味得毒,而至于耶!”^{[3](1587)}这些言论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的复杂心境与微妙态度。林纾认为,其实《与萧翰林俛书》同时表达了悔过、自讼之意。他说:“通篇全为引罪认过而发,然亦间出所以致谗之故,似谗者皆有求不遂之人也。”^[68]吴小林评《惩咎赋》说:“以‘惩咎’为名,曲折含蓄地控诉腐朽保守势力对自己的排斥打击,表示仍然坚守理想的不屈意志……总之是躁进有余稳健不足,导致了改革事业的失败。”^[69]此言甚是。其实柳宗元本人在《惩咎赋》中,就已经表达了对年少政治选择的深刻反省,对遭到排挤打压的愤懑以及对改革初衷的坚持与辩护。柳宗元寓诸文词的纠葛情感,为其作品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历代学人对柳文的不同解读路径,均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其创作实际。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柳宗元对于后世而言是“不在场”的,无论是忏悔、怙过还是讼冤,都未必能准确地反映他的真正态度,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但是,接受者在阐释过程中却不断折射出其审美偏好、理想观念乃至念兹在兹的现实关怀。因此,其对柳文的多元化阐释也超越了文学批评本身,而与接受者自身的人格及政治诉求、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如果以这种眼光重新审视柳文,我们或许能更好地体认其超越文本的文化价值。

注释:

- ① 关于时代因素对柳宗元研究的影响,可参看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刘真伦、岳珍《柳宗元思想研究百年述评》(《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等。
- ② 有关柳文接受的研究成果,可参看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

-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古家臻《清代柳文评点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周玉华《明清柳宗元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张知强《“桐城不喜柳州文”之检讨》(《北京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 刘雨晴《柳宗元文章取法诸子论及其文章学意义》(《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0 期), 李栋辉《柳宗元诗文在宋代的接受》(四川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等。
- ③ 晁补之指示了这些骚体文的具体篇目, 入选其选本《变离骚》的有《瓶赋》《囚山赋》《愚溪对》《乞巧文》《宥蝮蛇文》《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吊苕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正话反说、借题发挥的骂世文章; 入选《续楚辞》的有《怨咎赋》《天对》《晋问》《招海贾文》, 这些文章的情况较为复杂, 既有愤世嫉俗之文, 也有《晋问》等有关道德训诫之文, 《闵生赋》《梦归赋》等文则不明归属。详见刘真伦《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作者、篇目及佚文辑存》(《古籍研究》2012 年第 Z1 期)。
- ④ 《文苑英华》《唐文粹》收录韩文数量转引自陆静《论宋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取舍及其影响》(湖北大学 2021 年硕士论文, 第 16—22 页), 《文苑英华》《唐文粹》收录柳文数量系笔者统计。
- ⑤ 现存的南宋古文选本多为理学家群体所编, 非理学家编撰且同时收录“唐宋四大家”的选本数量较为有限。尽管如此, 从柳文在南宋理学家的古文选本中的入选数量通常居于“唐宋四大家”第四位的情况来看, 仍可见南宋理学家群体对柳文的评价不及其他唐宋文家。
- ⑥ 表格数据根据裴云龙《理学思维的儒学史审视——北宋六家散文经典系统的建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 第 89—90 页)、裴云龙《重构记忆: 论宋元时期韩柳散文典范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 第 130 页)整理。
- ⑦ 表格数据根据付琼《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与明末赅续本考录》(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82—183 页)、江枰《苏轼散文研究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557—558 页)整理。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 崔铕. 后渠子[M]// 明别集丛刊(第 2 辑): 第 5 册. 合肥: 黄山书社, 2015: 282.
- [3] 柳宗元. 柳宗元集校注[M]. 尹占华, 韩文奇,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4] 汤江浩. “二王刘柳”并称新论[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59—63.
- [5]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其昶, 校注. 马茂元,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513.
- [6]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7] 田恩铭. 中古史传与文学研究[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5: 117.
- [8] 朱熹. 楚辞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81.
- [9] 汤江浩. 试论柳宗元散文在北宋时期的接受问题[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4(1): 53—57.
- [10] 李芳民. 柳宗元思想的独特性及其思想史意义: 以《非国语》对“大中”思想的阐发为讨论中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61(4): 35—44.
- [11] 范洪杰.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 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38(4): 37—43.
- [12] 关行邈. 北宋天人关系思想研究[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
- [13]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278.
- [14] 梅尧臣. 答王补之书[M]// 《全宋文》: 第 28 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159.
- [15] 苏轼. 苏轼文集[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703.
- [16] 司马光.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第 5 册[M]. 李之亮, 笺注.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248.
- [1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8] 洪迈. 容斋随笔[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9] 王水照. 历代文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20]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刘友智, 校注.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114.
- [21] 王若虚. 王若虚集[M]. 马振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22] 戴表元. 戴表元集[M]. 陈晓冬, 黄天美,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 [23] 谭景星. 与高侯碧溪书[M]//《全元文》:第3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88.
- [24] 王立道. 校刻具茨先生文集[M]. 刻本. 无锡:王化弘嘉乐堂,1578(明万历六年).
- [25] 胡寅. 致堂读史管见[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6.
- [26] 程敏政. 皇明文衡[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33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879.
- [27] 方孝孺. 方孝孺集[M]. 徐光大,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468.
- [28] 范仲淹. 述梦诗序[M]//《全宋文》:第1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92.
- [29] 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唐武标,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96.
- [30] 赵彦卫. 云麓漫钞[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45.
- [31] 陈善. 扞虱新话[M]//全宋笔记:第4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328.
- [32] 周思兼. 周叔夜先生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93.
- [33] 陆淳. 春秋啖赵集传纂例[M]//丛书集成初编:第36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1.
- [34] 章士钊. 柳文指要[M]. 北京:文汇出版社,2000.
- [35] 赵轶峰.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J]. 社会科学辑刊,2012(4):152-162.
- [36] 王世贞. 读书后[M]//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70.
- [37] 陈继儒. 陈眉公先生全集[M]//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53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62.
- [38] 王志坚. 古文读编·柳州集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195.
- [39]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北京:中华书局,1958:199.
- [40]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22-223.
- [41] 章世纯. 章柳州集[M]//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22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210.
- [42] 陈懿典. 陈学士先生初集[M]//明别集丛刊(第4辑):第7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76.
- [43] 宋存标. 秋士偶编[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75.
- [44] 赵宏祥. 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3):191-200.
- [45] 章建文. 御选古文渊鉴评注辑校[M]. 合肥:黄山书社,2022:303.
- [46] 赵绍祖. 琴士文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1.
- [47] 陈祖范. 司业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125.
- [48] 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95.
- [49]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309.
- [50] 李慈铭. 越缙堂读书记全编:第2册[M]. 张桂丽,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 [51]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75.
- [52] 储欣.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河东先生全集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74.
- [53] 冯景. 解春集诗文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54] 吕留良. 晚邨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柳文精选[M]//四库禁毁书丛刊:第9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59-360.
- [55] 黄瑚. 黄夏孙遗集[M]//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12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324.
- [56] 乾隆. 唐宋文醇[M]. 乔继堂,点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
- [57] 何焯. 义门读书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58] 纪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97:2009.
- [59] 韩晓芹. 想象的偏差与错位的对话: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观念的转变[J]. 文艺争鸣,2024(6):92-97.
- [60] 徐经. 雅歌堂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61.
- [61] 秦笃辉. 平书[M]//丛书集成初编:第23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70.
- [62] 丁晏. 颐志斋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80.
- [63] 陈三立. 散原精舍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86.
- [64] 裴云龙. 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研究:南宋金元时期(1127—1279)[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203.
- [65] 郭文仪. 晚清文人的中唐情结与文化想象[J]. 国学学刊,2022(1):109-125,141-142.
- [66] 陈柱. 中国散文史[M]. 上海:上海书店,1984:206.
- [67] 杜晓勤.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1214.
- [68] 林纾. 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M]. 慕容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74.
- [69] 吴小林. 柳宗元散文艺术[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44-145.

Remorseful, impenitent and aggrieved: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and its transformation of Liu Zongyuan's post-demotion prose

YU Zukun, HUANG Wen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much debate among scholar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regarding Liu Zongyuan's attitude towards the Yongzhen Reform in his works written after his demotion. The official historie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tentionally portrayed him as a loyal and obedient penitent, which caused most readers to interpret his works from a perspective of repentance. Liu Zongyuan's thought emphasized intellect over ethics, advoc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s well as the separ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s, which was in conflict with the concepts emphasized by Neo-Confucianism, such as moral introspection and opposition to Buddhism to defend Confucianism. Therefore, the Neo-Confucian group often criticized his character and deeds, arguing that his works revealed flaws in his conduct. The drastic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made scholars empathize with Liu Zongyuan's tragic experience, leading them to deeply identify with him and thus regard his works as appeals for justice. These viewpoints converged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forming a diversified interpretation landscape. However,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urbulent situation of the time and that of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u Zongyuan's works returned to the perspective of appealing for justi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Liu Zongyuan's works have mainly followed three paths: repentance, adhering to past mistakes, and appealing for justice. These paths have intertwined and evolv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Liu Zongyuan's works.

Key words: Liu Zongyuan; prose criticism; Yongzhen Reform; interpretation

[编辑: 陈一奔]